

报告文学的春天来了?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在角色中寻找“安静”的意义

演绎 朱又可

{ 三代女人的故事 }

5月17日开始在爱奇艺在线公映的电影《春潮》中，郝蕾扮演了一个东北城市的40岁的女记者郭建波，在职业上坚持理想精神，采写了一系列调查性报道，但回到家中她却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多余人。

所谓家，其实就是三代，三个女人。离异的母亲三十年来独自把郭建波带大，郭建波又有了一个非婚生的女儿。生活的压力和种种的不如意使得母亲既脆弱又强势，常常向她们二人发飙，甚至不忘咒骂早已去世的“大流氓”丈夫，她一人主导了家庭日复一日的压抑气氛。亲人之间难以彼此说服，持续着掌控与反掌控的斗争。面对日常困境，郭建波不吵不闹，以隐忍的软抵抗的方式来求得某种平衡，也包括在外过夜的方式来弥补家之不完整。

跟通常电影结局都会让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不同，这部电影并没有试图去解决问题。最后，母亲中风，原先盈耳的责骂停止了，郭建波的世界安静了，但所有的问题还在那里。



郝蕾在自家墙上画的壁画

郝蕾认可这样无解的结局，在她看来，现实生活也正是这样。“这个戏没有试图告诉观众如何解决，生活里也是很多事无解，就是一个常态，没有什么解决方法，我觉得最好电影结局就是这样的。生活中各种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能解决的只有我们自己，人改变不了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我们自己静静地提升，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对事物的包容性更加宏大了，也许它就大事化小了。”

{ 为什么要演这样一部电影? }

郝蕾说她三年前选择这部戏的时候，就是看中了自己的底色是跟她一样的。“我在某一个年纪希望表达什么对我来说很重要。而我会寻找这样的剧本，或者当这种剧本找到我的时候，我会同意去出演，因为这也正是我想输出的价值观。而演员本身和角色其实是万般差距的。这个剧本所表达的，也是我想表达的，且我愿意让自己变成那个状态，我刚好在追求这种状态，所以这个点是我跟《春潮》之间比较契合的。”

到了40岁的时候，她也开始“不惑”，懂得自己能承担和承受自己的命运。“明白这个世界有好多东西都是解决不了的，解决不掉你就屈服于它好了，就让它摆在那里，你自己也摆在这里，摆在生活之中。于是选择安静，这个真的就是我，40岁的我，40不惑，如果40岁有更多的疑惑的话，那就白活了。作为演员这个职业，我必须保持一份敏感，我必须保持我的独特性和独特的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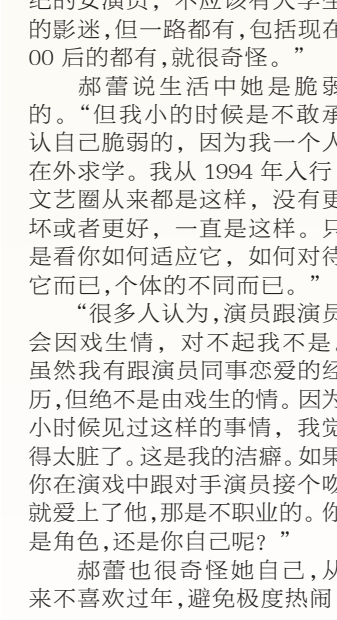
{ 精神的传承更重要 }

“除了演戏这个事，我对自己的什么都不自信，关于我长得好不好看，关于我为人好不好，我都不自信。”郝蕾认为不自信关系到原生家庭，她没有干表演这行的，不是世家。“我是读完初中离开家，因为我是独生女，长达几十年没有跟父母一起生活，我有一种亏欠感。我上大学了，我妈还跟我说，儿子，打电话给我。还跟我叫儿子呢，从来我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男孩。作为我这个年纪的女演员，不应该有大学生的影迷，但一路都有，包括现在00后的都有，就很奇怪。”

郝蕾说生活中她是脆弱的。“但我小的时候是不敢承认自己脆弱的，因为我一个人在外求学。我从1994年入行，文艺圈从来都是这样，没有更好或者更坏，一直是这样。只是看你如何适应它，如何对待它而已，个体的不同而已。”

“很多人认为，演员跟演员会因戏生情，对不起我不是。虽然我有跟演员同事恋爱的经历，但绝不是由戏生的情。因为小时候见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太脏了。这是我的洁癖。如果你在演戏中跟对手演员接个吻就爱上了他，那不是职业化的。你是角色，还是你自己呢？”

郝蕾也很奇怪她自己，从不喜欢过年，避免极度热闹。



郝蕾在淘宝鼓励明星开店的店开了个“浮屠念珠设计”的店，她能一整天坐在那里串珠子，她也临摹莫迪里阿尼的人物画，在家里的墙上，“我只是在画我心中的世界”。最近也玩刺绣，做这些手工的原因就是可以不用说话，让自己安静。“不跟人交流的时候我也挺能说，但最好不说。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不喜欢那种大喜大悲，我喜欢在一个平衡点上，那个平衡点可能对于我来说就叫安静，如常地去面对一切。”

郝蕾除了工作从来不上妆。出演娄烨的两部电影全是素颜，“他不允许化妆”。《春潮》也只打了底，画了淡妆。“但凡一化妆，我就觉得跟人有距离以外，就是感觉有工作要做了，所以我不喜欢这种开机模式。我希望是一个自由的、自然的、自在的状态。所以我的笔名叫自在，我在写词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不是郝蕾，郝蕾不重要。好多人都跟我说你需要曝光，我让我的经纪人告诉他们：感谢你的好意，我有我的主张。”

《春潮》在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中最后只得了个最佳摄影奖，郝蕾最终没有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样被“封后”。郝蕾说，她在乎的是终身成就和名字被写入表演教科书，而不是眼下的光荣和利益，因为精神的传承更重要。

郝蕾在自家墙上画的壁画

B 属于报告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看来，属于报告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个时代发展到今天，新闻、小说已经不足以表达或者描述这个时代的生活，生活本身的这种戏剧性、真实性、故事性、矛盾性、传奇性远远超过了作家的虚构。”

李炳银认为这个时代需要报告文学，它是最年轻的，但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而且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可塑性，可提供活动的空间和舞台非常大。

“人们往往认为虚构的小说天马行空充满了任何可能，但是作家的虚构有其固定性与逻辑性，真实的生活却无法预测。”

“人生很多计划在生活面前都没有力量，就像没有人能预测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而真实的力量是巨大的，而真实是所有文学的出发点。”介于生活与文学之间的报告文学，或许是呈现这种真实的最佳载体。

李炳银给报告文学下了一个定义：报告文学就是有担当、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在现实当中一种真实的观察、理解和图文并茂的文学表达。

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国发生了种种巨变，这个时代在呼唤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出现，记录时代，呈现真实。

何建明提到一个小插曲，2015年他到美国纽约大学讲课，中美两个国家的作家在对话，中国作家很自豪地在讲中国伟大的贡献，一个美国的作家站起来问我们：你们中国作家这么好，现在国家这么伟大，为什么还在写虚构，不写非虚构？

“当时我们都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提问给何建明带来强烈的思考：我们有如此丰富的题材，为什么没有写出伟大的报告文学作品？

而在李炳银看来，深圳从一个渔村变成一个世界上现在最先进的城市，但是我们依然缺乏一部和深圳这座城市成长历史相匹配的报告文学作品。

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也指出，广东报告文学虽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是还存在种种不足，“有‘高原’缺‘高峰’，精品力作不多。”

C 广东是报告文学的一座富矿

作为全国报告文学的重镇，广东报告文学百年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广东百年发展史的缩影。

张培忠回顾广东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称，广东文化先驱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即具备报告文学的雏形，为报告文学文体探索前行作出积极贡献；黄小配的《五日风声》堪称报告文学“啼声之作”，采用浅近的文言文详细地报道了辛亥“三·二九”广州之役的整个过程，这些都可以称为最早的报告文学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涌现了丘东平《向敌人腹地进军》、华嘉《香港之夜》、于逢《溃退》等优秀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产生了一批具有广东气派、广东风格的优秀作品。杜埃《沸腾的乡村》、司马文森《汪汉国的故事》、吴紫风《写在泥地上的诗》、草明《鞍山的人》、秦牧《复员军人杜美宗》、林元《渤海湾的浪潮》、黄谷柳《战友的爱——朝鲜通讯报告集》、杨黎光《没有家园的魂魄》、陈启文《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作品。

近几年针对社会热点，广东也出了不少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获全国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工程特别奖，2020年反映抗疫斗争的报告文学《千里驰援》在《人民日报》刊发。

“广东是报告文学题材大省，题材的优势如何转化为创作的优势，需要作家的敏锐发现，更需要作家狠下苦功。”张培忠呼吁。

作为岭南文化的发祥地、近代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前沿和先行区，广东是一片改革的热土，也是报告文学的一座富矿，广东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红兵表示，“这些都为广东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鲜活的题材和丰富的素材，怎样用我们手中之笔记录、反映这个时代，确实是每一位作家沉甸甸的责任。”

除了丰富的题材，广东非常重视对报告文学写作的鼓励与引导。在5月26日的推进会上，广东省作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范英妍公布了2020年广东重大现实题材和红色题材创作选题名单，包括长篇报告文学13部、长篇小说2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精品创作选题扶持名单也同时公布，包括长篇报告文学2部、长篇小说8部。25部扶持作品里，报告文学作品共21部，占比超八成，可见广东对报告文学这一题材的重视。

D 报告文学不能为获奖而写

报告文学有如此重要性，为什么报告文学市场越来越窄，受众越来越少？在何建明看来，之所以很多人认为报告文学不好看，一方面是因为搞评论、创作、宣传的人远远不了解报告文学，另一方面，不少人认为报告文学都是广告、宣传，可读性不强。

“很多报告文学，‘报告’多、‘文学’少，艺术探索不足。”张培忠指出，很多报告文学作品文学创新意识有所欠缺，题材、形式、手段发展不充分，观念、内容、技巧探索滞后。

“如果你把报告文学当成新闻，你就错了，它是一种全新的文体，有其独特的规律与特性。”李炳银也表示，当下中国的作家除了少数几个表现好一点，很多作家都没有把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优势、特长、可能性与价值发挥出来。

在李炳银看来，写好报告文学作品，一要用艺术的手段加工，“报告文学写作既要吸收新闻的真实性力量，同时又要运用文学艺术等艺术的手段，去架构故事推动情节的发展。”

二要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生活是什么样，就写什么样，对象提供了素材挖掘出来就行？“不是这样的，报告文学要有个人的选择和判断，切忌就事论事，写成流水账、工程报告、档案材料。”

何建明指出，中国报告文学有其特殊性，“作家要坚守个人与文学内部的定力，融入对人民的情感，自觉承担起报告文学写作的责任与使命，而不是为了获奖去写作，这样才能写出好的报告文学作品。”

此外，优秀的报告文学往往会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李炳银指出，很多作家在刻画人物时容易出现同质化、模式化和概念化等不良倾向。

“作家们应该努力开掘一些以往作品所未曾有过的新人物，或者从新人身上发现代表时代发展潮流和趋势的新品质、新特征。在文学技巧及手法上争取出新、出奇，以不同的叙事方式塑造令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新人物。而在写大人物的时候，不能用仰视的视角，要用平视的眼光去写。”

与小说、散文、诗歌等文体相比，报告文学在当下文坛的地位相对边缘化。5月25日，国内首个报告文学研究院在暨南大学揭牌成立；5月26日，广东省长篇报告文学创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称属于报告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自上个世纪80年代的黄金时期后逐渐边缘化，如今，报告文学的春天真的来了吗？谁能成为报告文学的“报春燕”？

A 从黄金时期、边缘化到重新起飞

1978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让报告文学成为文坛“当红炸子鸡”，随后报告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蔚然成风，于上世纪80年代迎来黄金时期。

在广东省长篇报告文学创作推进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表示，上个世纪80年代之所以成为报告文学的黄金时期，背后有着时代的因素，“为什么当时我们如此崇拜《哥德巴赫猜想》？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中，这部作品让知识分子、科学重新引领国家人民的发展方向，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在何建明看来，不同于诗歌小说，报告文学与国家、民族、时代的命运有更紧密的联系。

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转型，文学整体边缘化，报告文学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折，其独立性、公共性逐渐消失，主要分化为史志性报告文学和应邀写作的宣传性报告文学，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则逐步走向文坛的边缘，面目不清。

“很多时候报告文学作家都觉得孤独，大文坛讨论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的人太少了。”何建明回顾作家协会开大会的场景，900个代表里700个都是小说家和小说评论家，“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约莫三四十人，主席团就我一个，下面没几个，现在主席团和委员会好像就我和陈启文两个人了。”

此次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的成立、报告文学推进会的举行，都让报告文学这一文体重新得到更多的关注。在何建明看来，共建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有利于整合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和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与学科研究资源，形成中国高校报告文学学科，从而进一步推动报告文学的发展。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蒋述卓表示，广东继去年召开全省长篇小说创作推进会之后，广东省作协再次组织报告文学创作推进会，必定会对探索长篇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之路发挥积极作用。

呈现文学本土化的意义

洞见 杨超高

《本土经验》的一大贡献是在现代性大潮中“发现”了新文学的本土化历史。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国新文学是在学习西方文学与背离中国传统中发生的，贺仲明却认为，在现代性的文学大潮底下，存在着本土化的潜流，有许多作家在探求本土化、民族化道路，寻求新文学的独立与自我完备上，做了不少尝试。通过整体考察，作者将新文学的本土化历史概括为“两种方式”与“三个高峰”。其中，“两种方式”是对本土文学资源的重视和借用，对西方文学资源的中国化改造；“三个高峰”分别是20世纪30-40年代的“大众化”、“民族形式”讨论以及“工农兵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相融合的“十七年文学”，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在宏观把握外，作者也对新文学的本土化历史做了具体的分析。以废名为例，作者认为废名的小说创作借鉴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和韵味，同时寄寓着包括佛道家精神在内的传统文化与思想意蕴。又如孙犁，大多数学者都观察到孙犁身上的传统文化因素，贺仲明却指出：孙犁确实受到中国传统

文化的影响，但不是主流传统文化，而是通过乡村这个“小传统”过滤后的文化。再如周立波，作者也注意到周立波在表现乡村生活、乡村语言以及借鉴古典文学艺术方面展现出文学本土化探索的高度自觉。

《本土经验》的另一贡献是从本土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新文学的种种问题。当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学与社会、与大众的日益疏离。对于中国新文学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作者将问题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作家们在本土化方面的缺失，具体而言，就是缺乏对生活的细致写实与深度表现，或者摒弃生活书写与现实主义的传统。中国新文学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民族个性。这也是中国新文学走向成熟以及与世界文学对话必须要突破的一个难题。作者指出，新文学诞生之初就显示了学习西方文学与否定民族传统的姿态，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真正具备民族个性的审美特征，反而呈现出强烈的异质文化特征。此外，《本土经验》还对文学书写中的“爱”、“个人主义”、“中国故事”与“地域性”书写等重要问题进行理性审视，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

不过，《本土经验》并没有停留在揭示问题的层面上，而能够分析问题的原因，提出改进的方法。例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作者不仅指出文学应该书写生活，而且强调“真正深入生活的本质，揭示生活的内在困境，写出生活中人物的灵魂世界，写出独特历史文化在他们心灵和生活中的投射”。又如“个人主义”，作者虽然注意到了“个人主义”的弊端，但没有因此否定“个人主义”，作者清醒地认识到，“对当前中国文学来说，不是简单地摒弃个人主义，而是如何准确地选择和表现个人主义”，他提出的改进方案就是“个人主义”与民族文化、本土生活相融合。

《本土经验》最大的贡献是建构了可以与现代性对话的文学本土化理论。事实上，梳理本土化理论、针对新文学痼疾都是为理论建构而做的准备。在作者看来，文学本土化的基本内涵“可以确定为文学与其产生的本土现实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看其关联是否密切，能否体现出本土的深刻和独特，能否以独特深度和个性呈现其意义”。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学内容，即真实而深刻地反映本土或者本民族的生活；二是来源于本土的精神和思想，也就是深层次地反映民族文化传统以及民族情感与精神；三是融入本土大众的生活和文化世界中，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并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当然，要建构文学本土化理论，就必须厘清一些重要的关系与问题，在这一方面，《本土经验》展现出很强的思辨性。一个新的文学理论的建构，应该要“立足于具体的文学实践”，要具备独特的、有所创新的思想，同时，它还要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引导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从这些方面来看，贺仲明对文学本土化理论的建构无疑是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也是极有意义的——它既有利于“破解新文学的本土化难题”，又弥补了现代性话语的不足，指出了新文学的未来前进方向。

很长时间以来，现代性都是一个很时髦的词语，也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与准则，然而，现代性很难说是一个恰当文学标准。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开始反思现代性，但大多数的反思仍然是沿用现代性的思维来“修复”它本身，没有出现可以更新的理论思想。在这个背景下，贺仲明教授的新著《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以下简称《本土经验》)就特别值得我们注意。该书阐明了文学本土化的内涵，梳理了新文学的本土化历史，并且揭示了民族精神的内在核心以及文学本土化的呈现方式，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可以与现代性对话的文学本土化理论。